

当代中国语言 规划研究

——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

薄守生 赖慧玲 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

——国家与语言规划政策研究 王其成 著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125001

当代中国语言 规划研究

——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

守生 赖慧玲 著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 / 薄守生, 赖慧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04 - 8446 - 2

I. 当… II. ①薄…②赖… III. 汉语 - 语言规划 - 研究
IV. H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0557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特约编辑 李晓丽

责任校对 修广平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78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实验语音学口中的语言规划之音(序一)

凌锋 沈炯^①

汉语中的“语言规划”这个名词，我们听到的并不太多；英语中的Language Planning (LP) 却是一个很普通的术语。其实“语言规划”涉及的问题，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许多地道的南方人居然满口普通话，说得还很顺溜，却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就是“语言规划”之一。“语言规划”也并非在今天才出现的新事物，至少可以追溯到秦统一六国后的“书同文”政策。

当前，语言规划的许多问题，已经让人困惑。比如推广普通话，这本身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一项政策；但是，今天的社会条件和五六十年前相比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大规模的语言消亡，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有些学者很自然地“从生物多样性”引申出“语言多样性”，因为至少从类比上看，保护濒危语言不会比保护濒危动物的重要性差多少。但是这种类比是否合理呢？类似这样的问题，相信有很多读者都在关注。

国内专门探讨“语言规划”诸问题的专著并不多，该书即是其一。该书有两个特点很突出：一是系统，该书系统全面，内容整合得很好。二是新颖，从形式到内容，该书都是全新的。该书对国内外语言规划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做了一个梳理，从经济学分析、语言政治、语言法等不同角度对语言规划面临的很多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讨论了与语言规划息息相关的对外汉语教学战略、语言传播、语言与身份认同等重要问题。该书有纯学术层面的理论探索，也有应用层面上的对制定语言政策的建议。

该书的精彩独到之处颇多。例如《语言规划的经济分析》一章，把很多本来比较抽象的语言学现象用经济学术语一一具体化，并用经济分析的

^① 凌锋，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实验语音学硕士（导师沈炯），香港城市大学实验语音学博士（导师徐云扬）。

沈炯，上海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实验语言学博士生导师。

方法解释了很多我们长期以来有感性认识却又无法证明的现象。关于语言政治的讨论，也是一种探索。《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语言规划》一章也有诸多惊人之语，把“社会思潮、语言观与语言学史”联系起来具体地加以论述也是国内首次。关于“历史主义”、“区域主义”的相关论述，也有一些精彩之处。

该书无论在学理的探讨方面，还是在制定语言政策的建议方面，都非常朴实，没有一点绚丽浮夸、华而不实的东西。这种立足现实、立足学理，又不回避社会热点问题，既不放弃学理上对自圆其说的追求，也不放弃实践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的做法，是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学术成果的必要条件，这也是该书的成功之处。

语言学是一门横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学科。实验语音学相对比较接近自然科学，该书则主要侧重于研究人文的、历史的、社会的等方面因素，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阅读该书的兴趣。在此，我们留下了上面的这些声音，以此作为《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的序言。

文字学专家眼中的语言规划研究(序二)

詹鄞鑫^①

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开始制定语言规划。语言规划,主要包括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文字(后来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合并异体字、汉字简化等几个方面的工作。这些方面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汉字简化,开始是作为汉字拼音化之前的权宜之计,就字论字,缺乏整体规划。结果是,汉字的总数大量增加,字形只限定在常用字的范围,难以类推(且没有必要类推到非常用字和生僻字)。这真是进退两难。许多问题,利弊得失,当时是难以预见的,等到发现问题,就很难回头改变了。实质上,就是由于“规划”不周全造成的。

语言文字的规划,一旦确定就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所以必须周密谨慎,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可惜的是,当时正赶上“反右”运动,对汉字改革和简化字问题并没有进行充分的讨论。语言文字的规划,一动就会影响到几代人的口语和书面语的交流,岂能不谨慎呢!语言文字的规划,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该书对语言规划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在概括、整合大量相关论著的基础上有所提升,给读者带来全新的视野和理论的探讨,是很有益处的。把中国语言文字的规划作为问题来研讨,在理论上很有必要,在实践中也不能回避。

中国古代也曾有过多次语言文字的规范和规划,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指导实践。俗字和简体字历代都有,但历史上的规范都是以《说文解字》为基准的。这就是中国语言文字规范的优良传统。

语言文字学包括的内容很多,旧说有文字、音韵、训诂,新说涵盖语音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计算语言学、语

^① 詹鄞鑫,福建建瓯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字学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古文字研究室主任。

言哲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等。语言规划不仅包括语言学，还涉及其他众多的学科。对于“语言规划研究”来说，我作为门外汉，不敢多谈，只能借题发挥而已。在此，我写下了上面的文字，姑且以此作为《当代中国语言规划研究——侧重于区域学的视角》一书的序言吧。

自序

薄守生

理论语言学在国内，已故的徐通锵先生是大家。过去人们曾经咨询徐通锵先生学习“历史语言学”有什么“捷径”，当时徐先生说“很难有什么捷径”，“最好具备一些语言学的基础知识”，“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能把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知识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思考”。北京大学语言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陈保亚先生多次公开表示，他很希望那些具有跨学科背景的考生报考他这个方向。作为当今国内最优秀的理论语言学家之一的王洪君先生有个弟子王立（江汉大学教授），学过社会学，王立对理论语言学作出极大贡献的潜力也很大。于是，我们在思考，语言学的“边界”何在？仅仅局限于文字、词汇、语音、语法、语义等孤立的领地，每一个孤立的领地都不是完整的语言学，综合起来才是语言学，然而又如何综合呢？语言学是什么，“语言学之内”与“语言学之外”又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呢？

本书把握好了“语言学的边界”的尺度了吗？本书是不是语言学理论的又一大创新？笔者不敢自我评价。在“边界”和“创新”的问题上，最容易出现的毛病是“无根游谈”不似学术，本书有无此缺点呢？

本书“前言”部分关于语言的区域性的介绍，与桥本万太郎的相关论述有相通之处，但是所立足的“社会背景”、“历史根据”更为真实。

第二章“语言规划实践简史”有个基调，即“对于原本泛泛的历史，我们无法苛责这些历史的泛泛”和“就是对整个中国语言学界而言，研究‘国外语言规划史’恐怕都是悲观的”，这影响着整个章节的写作。但是，本书在多处又反复强调“建立语言的历史是语言规划的前提之一”，与第二章的这个基调似乎有点矛盾，只是各章各处所论述的侧重点不同。

第四章“语言规划的经济分析”，五节内容的安排方式、前后顺序都耐人寻味。第五章“语言政治与语言立法”，对“语言政治”进行了定义，关于语言政治的历史和现实都有介绍。

第九章“作为跨学科研究的语言规划”更是与语言学理论相关。“语言规划研究的跨学科性”一节内容，其中有我的亲身研究经历，也有许多其

他研究者的经验总结，这对传统的“语言学”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冲击。“‘描写+解释’与‘实证+思辨’”一部分内容，既体现了语言研究的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又对以往的语言学研究做了一定的反思，朴实而中肯。“社会思潮、语言观与语言学史”一节也很重要，但本节内容还不够详细，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花几年的时间专门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其他人“抢先”进入这一“领地”、我也不必再去“重复劳动”了的话），使这个专题更加丰满一些。

第十章“区域、冲突、融合”中，“关于汉语共同语史的问题”和“历史地看待语言变化”等内容，对许多问题具有拨开迷雾的作用。

或许有人会认为“该书探讨的是语言学本体外围的一些话题”，这正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语言学的边界”的问题（“语言规划”不是“语言学本体”本身）。我在“后记”中提到“海与岸的故事”，说作者以后要再多作一些语言学本体研究，且“无法逃避，却又难以选择”，这实在是意味深长。

语言学理论如何创新？语言学的边界何在？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疑问。关于这些疑问，我也很难思考清楚，只能希望读者们来启发我了。

关于语言、人和社会的区域论

——代前言^①

区域科学、区域主义从旧到新，经历了诸多变迁，取得了诸多突破。沃尔特·艾萨德指出“区域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最新学科”，它“采用多重分析与实践研究的综合方式，从地域和空维角度，对社会问题进行仔细、耐心的研究”，并对“区域学”下了多个定义，将区域学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②。区域科学中的区域的概念是指“包含地理空间因素的人类活动”^③，当然也包括人与社会。区域主义重视空间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它又与历史主义联姻，空间与时间结合起来，可以说，割断历史谈区域是空泛，无视空间谈时间是虚妄。所以说，“‘存在空间’是具有时间向度的人文空间”^④，历史流动也是具有空间向度的时间；“所有社会中都存在着某种时空结合，在传统社会里，这种结合非常强烈”^⑤。

当然，在远离传统的现代社会，我们关于“存在”的定位系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空间和时间，定位的维度已经多元化，但直到今天便于我们利用的维度却为数不多，无从应用的多维度只是一种纯理论体系，这种纯理论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在人类社会多维度定位系统可以实际应用之前，区域主义和历史主义是我们最为便捷的工具，除了以文学作品中的纯虚构小说和戏剧中的荒诞派等为代表的艺术领域外，人类的全部文化研究无不得益于这两个工具，可以说，区域主义和历史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为基本的两个工具。

① 这部分内容曾发表于《汉字文化》2008年第4期，在此略作修改。

② [美] 沃尔特·艾萨德著，徐继成译：《区域学》，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③ 杨开忠：《区域科学学科地位、体系和前沿》，《地理科学》1999年第4期。

④ 王兴中、刘永刚：《人文地理学研究方法论的进展与“文化转向”以来的流派》，《人文地理》2007年第3期。

⑤ [美] 约翰·劳维、艾尔德·彼德逊著，赫维人译：《社会行为地理——综合人文地理学》，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36页。

曾经时髦一时的“全球化”口号现已不再新鲜，我们并不认为“全球化”会真的突然袭来，未来世界的不平衡性还将是主流，一体化进程会不断地加强，但未来的世界不可能实现绝对的“一体”化。在这个“我与你”的世界里，人们不得不相互关联着，马丁·布伯说：“人生存在的基本事实是彼此关联着的人。人无法逃避与他人发生关系。我与你相遇，我和你彼此关联，即使我们的交往是一场相互斗争。即使在彼此的关联中，我已不完全是我，你也不完全是你。但只有在生动的关联中，才能直接认识人所特有的本性。”当然，“地球村”里的“联系”更加密切起来，在这样一个相互联系着的世界里，历史将成为人们唯一的根据，“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我已经变得不再是我，可是你却依然是你”，之所以有“你”“我”的不同，在于历史的不同，而不再是区域的差异；在相同的历史根据下，区域的差别也永远都不会消失，“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目前的我们就是处于这么一种情形之中：在联系日益广泛的世界（空间）里，历史是人的存在的唯一根据，不再有区域差别的影子；而在相同的历史根据下，区域是永远的差别，历史已经成了同义重复，历史不再有任何现实意义。

一 语言及语言规划的区域性

语言具有区域性，语言依存于一定的区域。语言规划具有区域性，语言规划是针对特定的区域进行的。语言规划的区域性与语言的区域性有关。

（一）语言的区域性

方言和共同语的联系与区别主要表现在区域性上，“共同语是一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语言，是全民族的通用语言。共同语是相对于方言而言的。方言是共同语的地域分支，是局部地区的人所使用的语言”^①。

方言是一种区域性语言。方言具有区域特征，区域特征即“在一定区域之内多种方言所共有的语言特征。区域特征可以是语音的，也可以是词汇的、语法的”，“不同方言之间的共同特征有时是类型上相同的特征”^②。语言的类型特征、地理特征和源流特征虽然可以是相关的，却是不同质的，但是它们都可以统一于“区域特征”这一概括：类型特征超乎时空，着眼于

^① 马景伦：《汉语通论》，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 李如龙：《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0页。

结构或功能的类型分析；地理特征是地理上横向扩散而造成的共同特征；源流特征是由于同源关系而形成的发生学上的共同特征^①。城市语言调查、社区语言调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等，也都是在特定的区域内进行的，分别针对不同的城市、城市里的不同社区、少数民族聚居区。社会方言也存在于一定的区域之内。

民族共同语是特定民族在居住区域内共同使用的语言，国家通用语是在整个国家行政区内通用的语言。国语、官方语言，也是就特定国家的特定行政区域而言的。人工的世界语，是就整个地球这个大区域来设计的。

历史语言研究中，诸如对近代汉语官话标准音是南京音、洛阳音还是北京音等问题的争论，也是语言的区域性问题。耿振生认为即使不承认近代汉语官话有标准音，也要承认近代汉语官话要有其核心成分，而这些核心成分必定有其语言的核心区域^②。

每一个词都有其区域性。如果把词看作一个相对自足的实体，“随着语言的历史发展，词的这种自足性也在发展、强化”，符号性在增强，理据性在减弱，词的空间区域性不可忽视^③。汪维辉认为“每一个词都有其时代性和地域性。时代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时段内使用，地域性是指词只在一定的地域内通行……论证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都是难度很大的工作，地域性比时代性更难……有的词从古到今一直使用，它们的时代性表现为‘泛时性’。有的词没有地域限制，它们的地域性表现为‘泛空性’。既具有‘泛时性’又具有‘泛空性’的词属于‘泛时空性’词。汉语中有一批‘泛时空性’词，它们属于基本词汇，比如天、人、手、山、牛、东、来、大、一等。如果从一种语言的通史着眼，具有‘泛时空性’的词不会太多，词库中的绝大多数词是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④在研究历史词汇时，即使在时间上“错位”的“区域性”都可能有一定的作用，“结合现代方言来研究历史上的常用词变迁，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也是一片有待开辟的广阔天地”^⑤，更不用说同一时间断面上的区域性了。如同“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⑥一样，我们似乎也可以说：“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区域。”

① 李如龙：《汉语方音的比较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1页。

② 耿振生：《明清等韵学通论》，语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126页。

③ 薄守生：《词汇的层次地位和词汇研究散论》，《北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④ 汪维辉：《论词的时代性和地域性》，《语言研究》2006年第2期。

⑤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

⑥ 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35页。

关于方言的区域分界,历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认识。“虽然方言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公认的事实,但是对能不能根据各地方言的不同特点,把方言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方言学史上有的方言学家认为方言之间没有分界线。方言在地理上是渐变的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并没有一处是截然断裂的。但是方言特点渐变的结果,使处于这个连续的链条两端的方言差别十分明显,而两端的中间只是过渡地带,没有任何边界……另有一种意见认为不同方言之间存在截然的界线,而方言地理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些客观存在的界线。这种想法,大约是受纯粹的自然地理学观念影响的结果,以为方言的界线和自然地理的界线一样,是截然可辨的。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的成分。”^①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方言不存在界线,“对于整个语言系统存在而言,不存在任何可以分割出来的完整的语言区域。而就语言生存状态的自然空间分布来看,语言区域的界线也只是在相对意义上存在。因此,在全部的语言现象中,没有任何一个被划定了的语言区域是孤立的、封闭的或是一成不变的”^②,语言的区域界线不是真实的自然区域界线。但是,语言的研究却离不开自然的区域,语言的客观存在和语言的主体语言人,都离不开自然的区域。

无论全球化会如何发展,任何语言变体的产生,都可以定位于某个起源区域;不管语言成分如何复杂,总是由不同的区域语言的层积、叠加、消亡、增生、互补、影响而产生的,即使成分再复杂的语言,也只能存在于某一些具体的区域之中,无法脱离于所有区域之外。语言具有区域性,这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命题。

(二) 语言规划的区域性

语言规划具有区域性。从大的方面看,语言规划的主体一般是国家或者特定的地区,它们存在于特定的自然区域之中。从小的方面看,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无不表现为对本国内不同的区域的语言的描写、论证、规划和安排,包括对本国内不同区域的语言关系的协调。

关于语言规划的区域性,具体内容请参看本书正文中的相关章节。

综上所述,语言规划的区域性与语言的区域性相关联,语言规划的区域性离不开语言的区域性,但是语言的区域性却不能绝对地规定语言规划的区域性,语言规划的区域性还要考虑到语言之外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

^①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3页。

^② 裴文:《语言区域划分的时空观设定》,《语言研究》2004年第3期。

会的诸多因素。

语言研究无法脱离社会，更无法脱离社会中的人，语言是社会人的语言，不是“动物”语言，也不是“一个人的”语言，社会人是语言的主体。社会人存在并且不得不存在于特定的空间区域之中。

二 中国的区域政治史

中国的“区域政治”史，在这里也就是指中国的“空间政治”史，它并不是专指中国的古代史，也包括源源不断地接踵而来的未来的“历史”。但是，要谈历史最好还是从古代谈起。

本部分内容限于宏观的解说，意在说明中国政治史受其区域性的影响。关于中国历代政治的区域特征的研究，学术界尚无成果问世，并且，此类问题不属于本书的关键内容，本书不予具体分析。概括性地介绍中国的区域政治史，仅仅用于辅助说明“语言、人和社会都具有区域性”，为这种“具有区域性”提供宏观背景和理论铺垫，从而为研究中国语言规划提供背景和解释，并不是为了介绍区域政治史而介绍区域政治史。

（一）风水宝地

中国的历史“受亚洲大陆气候地理关系的影响”，“中国文化是亚洲地理的产物”，“中国西北、西边及西南的高山和难以通行的遥远广袤的中亚，使它实际上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它的北方是蒙古的沙漠和干草原及西伯利亚和东北的近北极地带。部分由于这一原因，中华文明的传统比历史上任何其他文明更持久、更具凝聚力，在更长的时间内很少发生变化”^①。总体而言，历史上的中国基本上是背靠山崖、面临大海，背靠山崖面临大海既是一个迷信方术中的风水宝地的地形，又是一个保守的封闭地形。这种封闭造就了中国的主人主要是土著居民，而不是真正的移民。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多次移民，但是，中国的移民往往是村落的整体搬迁，这种土著的移动对土著的性质影响很小，这也可以从方言岛的存在得到证实。方言岛主要包括“土著方言被移民方言包围而成为方言岛”和“移民及其方言直接造成方言岛”两种情况^②。我们可以把这种保守的未能充分融合的移民定义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移民。

风水宝地、土著、缺乏移民，促成了传统的根深蒂固，这是中华文明作

① 叶自成：《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2期。

② 游汝杰：《汉语方言学导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4页。

为世界上少有的未曾中断过、一直传承着的文明的原因。对于土著来说，历史就是根据，失去记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那涉及：世代居住的土地为什么是你的而不是我的？凭什么说是你的而不是我的？只因为有历史，原来是我的，或者说原来不是你的，所以现在是我的，就这么简单。如果失去了记忆，土著们会流露出恐慌的神情。而对移民或游牧民来说，就不存在这种冥顽不化的嗜忆症，他们都是流浪汉，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原来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也曾失去过，所以，他们的根据主要不是历史而是现状。自上古三代到晚清，除了元朝前期可以铁骑践踏历史外，历代都非常重视修史、正史以资治，就因为历史使他们感到心里踏实。随着最后一个王朝的离去，我们并没有走得太远，除了高呼“莫害我”被抬上去就不愿下来的总统，甚至还有人想复辟帝制，这也是历史惯性的误导。但是，在明清两代，中国的大海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中国的传统陆权政治受到了当时世界水平的海权政治的挑战。此后，中国遭遇了更多的外部因素，这些外部因素作用下的风水宝地显得格外的不稳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完整的陆权政治才得以重振雄风。

（二）海权强势的余波

近代科学的发展成功地解决了海洋的阻隔，利用了海洋的便利。随着海权政治的到来，几乎所有的政治都集中于海洋，人类产生了强烈的海洋依赖，出现了对海洋的迷信与崇拜。在这种海权政治强势的余波中，中国还是选择了改革开放的英明决策。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终于彻底破碎了风水宝地里的海洋之窗，通往罗马的条条大道就在海洋的平面上逐一铺开，海洋崇拜使一个风水宝地得以终结。

保守地看，陆地是根基所在，文化的根基在陆地，在沃野千里，不在波涛万丈。波涛里的文化往往也是随波逐流，阴险而诡谲。土著和传统对中国的政局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土著是长老制度的乐土，接班制度是长老制度的延续与变异，这又与自上而下的政治一脉相承。自上而下的政治在各种制度的国家中都普遍存在，自上而下的实质戳穿了公共政策代表了“民众的要求”的神话^①。中国土著的绝对优势，移民的相对缺少，接班制度是草根与树林排队的自然序列。而真正的移民国家，均匀分布的四面八方的来客是形成各自发展的自然力量，“美国梦”就是因此而鼙声如雷的。当然，空间

① [美] 托马斯·R. 戴伊著，鞠方安、吴忱译：《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200页。

并不能绝对决定政治，“地缘政治的任何发展都应以制度建设为前提”^①，仅仅依靠区域特征、空间优势、自然禀赋是不够的，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社会，而不是自然物的社会，所以，现代社会是崇尚制度建设的社会，绝对不是后现代主义所鼓吹的无秩序社会。

（三）海陆复合系统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陆权回归，作为对海洋崇拜的反悔，中国适时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政策。“中国虽然海陆属性都具备，但本质上，中国的自然特性和历史文化决定了中国主要是一个陆权国家。中国能在几千年中分而不散、弱而不灭，始终是一个统一国家，与中国的大陆属性密切相关”，并且海洋空间不够稳定，“海上力量具有不可持久性，聚集得快，散失也快。靠海权而强大的国家少有支撑三百年以上者”^②。就地球而言，海洋和陆地是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海陆具有同构性。海陆是一个有机整体，我们不能用机械的二元论来把它们分解开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海洋作为人类的栖息地用于减轻陆地的人口压力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海洋也可以表现出某些稳定性。

风水宝地的空间组合，土著的古老历史，海洋崇拜以及陆权的回归，这就是中国的空间政治史。在当前情况下，空权从属于陆权和海权，太空权是一个富有挑战的新的命题。当然，我们不能为简单化的区域论模式所束缚，“地缘政治学”在“恢复了历史性和情景性”之后，“走出了简单化和决定论的泥沼”^③，实现了新的转向。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六百英里的范围内，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沿海五百英里的范围内，这种人口的空间分布无疑也会影响到政治。

与土著、陆权政治、海权政治、海陆复合系统等说法相对应，表现在语言上，可以有“牧畜民型语言”和“农耕民型语言”的说法，“牧畜民型语言”主要用来指印欧语言，“农耕民型语言”主要用来指亚洲（尤其是东亚）语言^④。中国的区域政治史与中国的语言特征不无关联。

① 叶自成：《从大历史观看地缘政治》，《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6期。

② 同上。

③ 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62页。

④ [日]桥本万太郎著，余志鸿译：《语言地理类型学》，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4页。